

西方马克思主义视阈下的欧洲一体化

高奇琦

内容提要 20世纪后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经历了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到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过程。这三大流派实质都是一种以生产关系为核心概念的政治社会分析或政治文化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从经济学逻辑向社会学逻辑转向的趋势,与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变迁趋势相契合。从更为宏观的社会科学研究背景来看,这种转向也可以通过普遍性逻辑和特殊性逻辑的辩证关系来理解。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欧洲一体化 西方马克思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欧洲一体化研究是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并不是西方一体化研究的主流。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入,一体化研究日渐成为欧洲学界的显学和主流,越来越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参与到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之中。

本文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的解释进行比较,以探求欧洲一体化整体研究所呈现的从经济学逻辑向社会学逻辑转向的趋势。

一、欧洲一体化: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解释的深刻与困难

在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欧洲一体化分析中,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其主要理

* 高奇琦: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教授。(邮编:201620)

论工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列宁使用了“国家垄断”这一概念,并表述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垄断不过是提高和保证某个工业部门快要破产的百万富翁的收入的一种手段罢了。”^①在之后的《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一文中,列宁进一步指出,“尤其是在20世纪,资本主义已大大向前发展了……一般垄断已经过渡到国家垄断”。^②一些学者根据列宁的定义将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即垄断资本通过国家来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以保证垄断组织获得高额利润(或最大限度利润)。^④

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由亲莫斯科的西欧共产党或共产主义组织传播至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末西欧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浪潮中,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使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来分析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理论认为,任何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都将导致垄断企业的融合,并使国家成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垄断的工具。控制国家和控制垄断资本的“国家和资本精英”通过资本主义网络相互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促进了政府和工商组织的融合,而国家官员和垄断资本家联合起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管理以控制日益加剧的经济社会矛盾。^⑤到20世纪60年代末,伴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启动和推进,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来分析这一正处于成长初期的一体化进程。这些学者多数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欧洲各国的统治阶级弥补垄断硬化症(sclerosis of monopoly)和瓦解工人运动的最后努力。

运用垄断资本主义分析欧洲一体化最有影响的是比利时学者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其1970年著作《欧洲与美国?帝国主义的矛盾》中,曼德尔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欧,与国家政权的结合已经不足以维护垄断资本的利益,因此,垄断资本会跨出民族国家边界而形成超国家的制度安排。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垄断资本国际化的一部分。为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欧洲的垄断资本可以选择与美国资本结合,也可以在欧洲范围内进行更大规模的聚化和集约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是美国垄断资本在欧洲扩张的一种表现,而欧洲资本集聚是对美国资本在欧洲扩张的一种抵制。欧洲一体化的推进可

①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05页。

② 《列宁全集》第2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③ 陶大镛:《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践和理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第26—40页。

④ 褚葆一主编:《经济大辞典》(世界经济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页。

⑤ Bob Jessop, *The Capitalist State*, Oxford: Martin Robertson, 1982, p. 32.

以在制度上有利于欧洲范围内资本的集聚。^① 在1970年发表在《新左派评论》上的《不平等发展法则》一文中,曼德尔更为明确地将欧洲一体化的考察置于美欧资本比较和美欧关系的背景之中。曼德尔认为,欧洲资本的联合、集聚和理性化正在战胜美国资本的规模优势。欧洲的生产力水平正在赶上美国。由于欧洲的工资水平低于美国,这使得欧洲的商品可以以价格优势冲击美国市场。美国资本向欧洲的渗透并没有导致欧洲资产的去民族化,相反,民族国家仍然在捍卫民族资本的利益。欧洲并非是美国的新殖民地。欧洲联盟及欧洲超国家的形成可以使欧洲在更为平等的基础上与美国资本展开竞争。^②

另一派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论者如美国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的联合主编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和哈里·麦格朵夫(Harry Magdoff),以及美国左翼社会活动家马丁·尼古拉斯(Martin Nicolaus)则持与曼德尔明显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美国不仅是当时帝国秩序的主导,而且这种主导在未来一段时间也将继续。美国公司在规模、技术和管理等方面都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美国正在利用这一优势占据欧洲工业的关键部门。最终,美国公司将会主导欧洲的经济秩序,而且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欧洲国家的资产阶级会最终去民族化,在客观上变成美国资本的代言人。同时,在这一进程中存活下来的欧洲资本也会变得很虚弱,并完全被美国资本所主导。主导的美国资本与从属的外国资本结盟会形成一个美国霸权治下的“统一的帝国主义”(unified Imperialism)。^③ 这一派学者对欧洲资本的生产力水平持怀疑态度,对欧洲一体化的未来也持否定立场。

当然,还有更多的欧洲学者支持曼德尔的观点,例如,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鲍勃·罗颂(Bob Rowthorn)、英国兰卡斯特大学法学教授索尔·皮乔托(Sol Picciotto)和英国利兹大学政治学教授雨果·雷迪斯(Hugo Radice)等。通过较为详细的考察和论证后,罗颂得出结论,欧洲资本不仅具备与美国资本竞争的实力,并且可以通过直接投资等海外扩张方式(包括在美国投资)对美国资本进行反制。欧洲范围的资本兼并及相关超国家机制会大为提升欧洲资本与美国资本的竞争力。^④ 皮乔托和雷迪斯将欧洲一体化视为资本与国家进一步聚合的过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问题的根源在于资本的过度集中,而这种过度集中排斥市场自动调解过程的发生。由于反抗剥削的劳工运动日益强大并在政治上挑战资本

^① Ernest Mandel, *Europe versus America? Contradictions of Imperi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0, pp. 55-94.

^② Ernest Mandel, "The Laws of Unequal Development," *New Left Review*, No. 59, January-February 1970, pp. 19-38.

^③ Paul Sweezy and Harry Magdoff,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Monthly Review*, October 1969, pp. 1-13; Martin Nicolaus, "The Universal Contradiction," *New Left Review*, No. 59, 1970, pp. 3-18.

^④ Bob Rowthorn, "Imperialism in the Seventies: Unity or Rivalry?" *New Left Review*, No. 69, 1971, pp. 31-51.

主义的权力,资产阶级不得不发展复杂的国家管制和干预系统来确保资本的再生产和规避危机的发生。两位作者认为,欧洲煤钢工业的产能过剩在历史上导致了多次吞并和战争的发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霸权主导和苏联威胁的特殊情境却促成这一经济问题和平解决路径的出现。^①

尽管两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者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有明显差异,但从总体而言,这两组观点的核心概念和分析方法还是一致的。这两组分析中最为核心的概念都是资本,基本方法也都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常用的政治经济分析。在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分析中,民族国家和欧洲一体化仅是资产阶级获得超额经济利益的工具或副产品。如果从国家理论来说,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都持有明显的工具主义国家观。马克思的经典分析将国家视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拉尔夫·米利班德(Ralph Miliband)把马克思的这一经典分析发挥到极致。他认为,国家虽然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但从根本上说它仍然是资产阶级维持其统治和实现其利益的工具。只不过,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不是国家,而是欧洲的超国家,可以说这两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都是工具主义的欧洲一体化观点。

然而,到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关注出现一些变化,譬如马克思早期的理论和作品被重新发现和解读,再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重心从经济分析转向国家和社会分析等等。这种转向在欧洲最经典的例子体现在“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之辩”(Miliband-Poulantzas debate)中。希腊出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尼科斯·普兰查斯(Nicos Poulantzas)反对米利班德的工具主义国家观,并提出一种结构主义的国家观,认为国家结构凌驾于资本家个人和资本家阶级派别的特殊利益之上,通过其相对自主性保证各统治资本家阶级利益的稳定性。普兰查斯则试图表达一种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②虽然米利班德和普兰查斯辩论的核心是国家的自主性地位,但其对欧洲一体化还是有指导意义的。

在工具主义视野下,欧洲一体化主要是资产阶级跨越国家边界实现其资本利益的工具。在结构主义视野下,欧洲一体化则可以被视为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跨

^① Sol Picciotto and Hugo Radice, "European Integration: Capital and the State," *Bulletin of the CSE*, Vol. 1, No. 1, 1971, pp. 32-54. 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Conference of Socialist Economists, CSE)是设在伦敦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大会公报》(*Bulletin of the CSE*)是《资本与阶级》(*Capital & Class*)的前身。《资本与阶级》于1977年创刊。

^② Ralph Miliband, *Th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9; Nicos Poulantzas, *Political Power and Social Classes*, London: NLB, 1973; Ralph Miliband, "Poulantzas and the Capitalist State," *New Left Review*, No. 82, 1973, pp. 83-92; Nicos Poulantzas, "The Capitalist State: A Reply to Miliband and Laclau," *New Left Review*, No. 95, 1976, pp. 63-83. 一些中文文献参见〔希腊〕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367页。

越边界的一种活动。在此意义上讲,欧洲一体化是阶级统治在一定疆域上的重新组合。结构主义路径并不完全反对资本的作用,而是更为关注将资本包含其中的生产关系或社会关系。按照这一逻辑,欧洲一体化的目的是通过跨国公共管理和制度构建(与财产权和劳工权相关)来保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并不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国家,而是补充它。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还采用其他策略如全球化来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进行再生产。从这一视角来看,欧洲一体化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兴起的一部分,也是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结构主义国家观的兴起导致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分析的衰落,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讨论并没有终结。之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主要分为三个流派: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

二、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欧洲跨国阶级说

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源头,是1974年阿姆斯特丹大学的一些学生和年轻研究者启动的一个以“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社会力量”为内容的研究项目。^①该项目的设立来自于研究者对这一时期欧洲一体化主流研究的不满。这时的欧洲一体化研究被联邦主义和新功能主义间的辩论所主导,^②而垄断资本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并未受到主流理论的重视。研究者对主流理论的不满主要表现为两点:第一,主流辩论中的自由多元主义假设忽视了潜在的社会权力结构和国家的阶级本质。第二,两种路径都忽视了欧洲一体化所发生的冷战情境。冷战情境中至少有两点对于欧洲一体化非常重要: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资本需要寻求对欧洲市场进入,以及试图取代战时主导欧洲的军事或准军事部门;二是在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西欧需要联合起来对抗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影响。所以,阿姆斯特丹项目一开始就致力于挖掘一体化的深层因素。

① 这一项目设立的背景如下:受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影响,荷兰学生在1969年发动了大规模学生运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行政楼被学生占领,并决定性地影响了之后1972年荷兰各大学的教学改革。1972年,新的教学改革给予学生在学术研究中比较高的地位。参见 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Concepts of Control: Towards a Genealogy of the Amsterdam Proj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No. 2, 2004, p. 116.

② 联邦主义思想源于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提出的以联邦求和平的观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意大利思想家阿尔蒂罗·斯皮奈利和经济学家恩斯托·罗西发表《文托特内岛宣言》,呼吁用联邦来永久地结束欧洲战争。战后,马凯(R. Mackay)等学者对联邦主义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发。参见 R. Mackay, *Towards a United States of Europe: An Analysis of Britain's Role in European Union*, London: Hutchinson, 1961。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英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大卫·米特兰尼(David Mitrany)。功能主义强调,只要在一些专业公共领域建立跨国功能性技术组织后,跨国合作就会从一个功能部门自动拓展到其他功能部门,并最终导致更为深入和广泛的合作。参见 David Mitrany, *A Working Peace System: An Argument for the 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43。

阿姆斯特丹学派早期的经验研究主要借鉴冷战史中修正学派的一些观点,^① 偏重分析美国利益对于欧洲一体化的影响。譬如,该学派代表人物谢斯·范德皮杰(Kees Van der Pijl)的研究表明,^②舒曼计划导致了欧洲煤钢共同体的产生,而这个计划很明显是美国为欧洲设计的。^③ 范德皮杰还将美国福特主义与欧洲一体化联系起来,他认为,由于美国的劳动力资本价格较高,所以到20世纪20年代时,以大规模生产和劳工控制为特征的福特主义就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方式,汽车工业是福特主义最典型的代表。2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是对这种生产方式的打击,但罗斯福新政以国家干预的形式保证了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的运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种模式通过马歇尔计划植入西欧经济的运行之中。国际鲁尔区的建立及跨国煤钢联营的出现是福特主义国际化的早期试验。煤钢工业曾经是纳粹德国军事工业的支柱,但经过福特主义的改造,煤钢工业已经被代表民用消费的汽车工业所支配。^④ 欧文比克的研究则表明,1945年执政的英国工党政府通过钢铁工业的国家化为福特主义系统引入创造了条件,而这一努力为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奠定了基础。^⑤

在1979年的《国际层面的阶级形成》一文中,范德皮杰开始将欧洲跨国阶级作为其欧洲一体化分析的基本概念,其研究受到普兰查斯的启发。^⑥ 范德皮杰认同普兰查斯的欧洲跨国资产阶级概念,但强调欧洲跨国资产阶级形成的历史情境及跨国资产阶级内部的冲突。在其论文《帝国主义和北大西洋地区的阶级形成》

① 冷战史研究的修正学派是相对于之前的传统学派而言的。在20世纪50年代比较流行的传统学派认为,苏联应该对冷战的起源负责,而美国是被动介入冷战。美国介入的目的是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和保卫自由民主制度。修正学派则认为,冷战不是起源于共产主义的扩张,而是美帝国主义扩张的结果。美国外交政策受到垄断资本集团的操纵和控制。为了在全球建立美国的经济霸权地位,美国策划了冷战的开始。参见 Denna F. Fleming, *The Cold War and its Origins 1917-1960*,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1; Gabriel Kolko, *The Politics of Wa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3-1945*, New York: Vintage, 1968; Joyce Kolko,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54*,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New York: Delta, 1962.

② 范德皮杰从1973年起开始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国际关系系任教,是阿姆斯特丹学派中最重要的的人物。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其他代表人物包括亨克·欧文比克(Henk Overbeek)和奥托·霍尔曼(Otto Holman)等。欧文比克侧重于研究英国国内的阶级变化及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等,霍尔曼侧重于研究南欧的民主化和国际化及其与欧洲一体化的关系等。这三位代表人物都有在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国际关系系长期任教的经历。另外,由于范德皮杰在2000年到英国苏塞克斯大学任教,使得这一以地域为特征的阿姆斯特丹学派指称变得有些虚弱。

③ Kees Van der Pijl, *Een Amerikaans Plan voor Europa*, Amsterdam: SUA, 1978.

④ Kees Van der Pijl, "Class Form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Capital & Class*, No. 9, 1979, pp. 6-12.

⑤ Henk Overbeek, "Finance Capital and the Crisis in Britain," *Capital & Class*, No. 11, 1980, pp. 99-120.

⑥ 普兰查斯认为,美国的生产资本在欧洲经济体中的渗透,对欧洲的公司及欧洲的阶级结构产生重要影响。普兰查斯指出,欧洲阶级结构的一个重组过程反映了欧洲资本对美国资本的绝对性依赖,并导致了美国生产关系在欧洲内的再生产。普兰查斯将美国的超帝国主义和跨国关系作为跨国历史唯物主义的 analysis 基础,他吸收了垄断资本主义论者的一些观点,但同时也创造性地将阶级和历史唯物主义置于跨国关系的视阈之内。参见 Nicos 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5.

和专著《大西洋统治阶级的形成》中,范德皮杰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进行历史叙事。^①另外,他的研究还偏重关注代表不同功能资本(商品资本、金钱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资产阶级之间为争夺全面的控制而产生的结构性利益冲突。^②

《国际政治经济学杂志》在1989年组织的“跨国关系与阶级战略”专辑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标志性成果。^③在专辑中,范德皮杰的论文是与欧洲一体化最为相关的,他对其之前提出的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理论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范德皮杰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欧洲资产阶级对“洛克心脏地带”(A Lockean Heartland)进行全面控制和争夺的一种努力。“洛克心脏地带”是范德皮杰提出的核心概念,^④此概念内涵包括三方面:(1)心脏地带主体是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市民社会;(2)世界银行家和跨国管理者为国家间的治理结构提供服务,并保证全球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运行;(3)“洛克心脏地带”是竞争性的全面控制概念(comprehensive concepts of control)起支配作用的领域。跨国资产阶级在洛克心脏地带之内和之外争夺霸权的战争,取代了世界政治的传统形式,而更多表现为“全球国内政治”(global domestic politics)的形态。^⑤

① Kees Van der Pijl, *Imperialism and Class Formation in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1983; Kees Van der Pijl, *The Making of an Atlantic Ruling Class*, London: Verso, 1984.

② Kees Van der Pijl, "Class Formation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Capital & Class*, No. 9, 1979, pp. 2-6. 范德皮杰的这一观点受到以米歇尔·阿列塔(Michel Aglietta)和阿兰·利佩兹(Alain Lipietz)为代表的巴黎规制学派的影响。法国规制学派的研究起点是葛兰西的福特主义(Fordism)概念。葛兰西认为,福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产生。这种新模式本质在于需要发展相应的社会机制来管理不加约束的资本积累。鉴于此,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一种集聚的财富。生产的再构建不仅需要新的技术基础,而且需要工人阶级在教育、技术和消费模式上的重新合成(recomposition),以及劳工关系在生产与销售层面的再组织。法国规制理论对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有较为深刻的解释。该理论认为,这一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组织危机,其解决办法是对嵌入资本积累的社会机制进行调整并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达成新的妥协。参见 Michel Aglietta, *A Theory of Capitalist Regulation: The US Experienc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142-160; Alain Lipietz, "Towards Global Fordism?" *New Left Review*, No. 133, 1982, pp. 33-47.

③ 该专辑由范德皮杰主持,作者包括范德皮杰、欧文比克和霍尔曼等。参见 Kees Van der Pijl,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and Class Strategy: Introduc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3, 1989, pp. 3-6; Kees Van der Pijl, "Ruling Classes, Hegemony,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3, 1989, pp. 7-35; Henk Overbeek, "British Capitalism at the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3, 1989, pp. 36-75; Otto Holman, "In Search of Hegemony: Soci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Domestic Politics in Spa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3, 1989, pp. 76-101.

④ 范德皮杰的这一观点受到世界体系论的影响。世界体系论用“中心—外围”的地缘维度来界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在沃勒斯坦看来,世界经济表现为“一种在中心和边缘地带间通过利润的转移而导致的日益极化”。参见 Immanuel Wallerstein, *Historical Capitalism*, London: Verso, 1983, pp. 30-31。范德皮杰使用的心脏地带也暗含了中心—外围的地缘划分。

⑤ Kees Van der Pijl, "Ruling Classes, Hegemony,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9, No. 3, 1989, p. 19.

根据范德皮杰的界定,“洛克心脏地带”源于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从一开始,这一国家/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就是跨国家的,其活动范围并不仅限于英国,而这一复合体在英国向外移民和殖民的过程中得到了扩张,并逐步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领导核心。如范德皮杰所言,“我们更倾向于说这是一个‘洛克心脏地带’,而不是一个‘个体的洛克国家’(individual Lockean states)。在这里,一种被资本国际化所驱动的社会国际化是更为本质性的特征。”^①与“洛克心脏地带”相对应的是“霍布斯国家”(Hobbesian State)。因为跨国空间主要由“洛克心脏地带”的盎格鲁-撒克逊统治阶级所主导,所以“霍布斯国家”的统治阶级在表达其国际利益时也经常受到限制。所以,对于这类“霍布斯国家”而言,其必须被迫采取持续的、革命的赶超战略。所以,国际关系的根本矛盾在于“洛克心脏地带”与“霍布斯国家”之间的对抗,结果往往是后者被前者击败。这样一种击败往往伴随着两种结果:一种是将失败者逐渐整合入心脏地带(如1945年的德国),另一种是去整合(如苏联)。^②欧洲一体化的实质便是“洛克心脏地带”逐步整合边缘地区(包括被击败的“霍布斯国家”)的过程。^③

2004年《国际关系与发展杂志》关于“阿姆斯特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特刊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又一组标志性成果。^④在该专辑中,范德皮杰和霍洛曼的文章是与欧洲一体化相关的。在其《新自由主义下跨国精英的两面性》一文中,范德皮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跨国管理阶级的概念。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整合都是劳工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labor)的结果,而劳工社会化由市场社会化和计划社会化组成。市场社会化自发地进行运行,而计划社会化则涉及到自觉的管理和控制,当代社会的全部权力关系都建立这两种社会整合之上,政治便是

① Kees Van der Pijl, “Ruling Classes, Hegemony, and the State System: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onsiderations,” p. 19.

② Ibid., pp. 19-20.

③ 在《一个洛克式的欧洲?》一文中,范德皮杰对此进行了更为明晰的讨论,这一观点对欧盟东扩有较为强大的说服力。参见 Kees van der Pijl, “A Lockean Europe?” *New Left Review*, Vol. 37, January-February 2006, pp. 9-37.

④ 参见 Bastiaan van Apeldoorn, “Transnation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 The Amsterda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rojec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110-112; 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Concepts of Control: Towards a Genealogy of the Amsterdam Proj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113-141; Bastiaan van Apeldoorn, “Theorizing the Transnational: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142-176; Kees van der Pijl, “Two faces of the Transnational Cadre under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177-207; Otto Holman, “Integrating Peripheral Europe: The Different Roads to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209-236. 在这组文章中,欧文比克的文章对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发展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而阿姆斯特丹大学国际关系学高级讲师巴斯蒂安·范·安德鲁普(Bastiaan van Apeldoorn)的文章对跨国唯物主义做了进一步的理论化。安德鲁普是阿姆斯特丹学派的新生代,他组织了本专辑。

在国内和国际层面上对这两种整合进行调节的过程。20世纪后期,新自由主义以市场社会化的方式席卷了整个世界,而欧洲一体化实质是新自由主义扩张的一部分。在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无产阶级之间新生的跨国管理精英阶级,一方面为市场社会化服务,另一方面以计划社会化的方式对市场社会化的问题进行修补。这便是其文章标题所言的“跨国管理精英的两面性”之所在。^① 霍洛曼在其文章《整合边缘欧洲:在南欧和中欧通往安全与稳定的不同道路》中使用了“边缘资本主义”(peripheral capitalism)的概念,该文主要对南欧和中东欧的民主转型及其与欧洲一体化之间的关系进行比较研究。霍洛曼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范德皮杰关于“洛克心脏地带”和“霍布斯国家分析”的一种案例研究。^② 尽管范德皮杰还谦虚地讲道,“阿姆斯特丹学派的称谓更多是学术界对观点相近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学者小组的友好称呼罢了”,^③但至此,阿姆斯特丹学派已经形成较为鲜明的学派风格,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占据一席之地。在欧洲一体化领域,阿姆斯特丹学派对欧洲跨国阶级的分析及使用“中心—边缘”维度对欧洲整合的分析是最为独特的。

三、新葛兰西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及其对训诫自由主义的批判

新葛兰西主义是近年来在欧美兴起并发展较为成熟的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流派。该流派把意大利共产党人葛兰西的“实践哲学”和政治思想应用到对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分析之中。葛兰西思想的核心由“实践哲学”、霸权和历史集团三部分构成。“实践哲学”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葛兰西认为,客观物质性是人类历史具体的实践创造的,是一种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不是一种“外在给定的客观”。^④ 葛兰西对观念的强调与其霸权的概念紧密相连,他认为,资产阶级社会不仅依赖公开的暴力,也依赖社会意识实行统治。文化、共识知识和公民社会构成了国家统治的组成部分。历史集团这一概念既反映了主客观的统一,又反映了结构与上层建筑的统一。用葛兰西的话说,“结构与上层建筑构成了一个‘历

^① Kees van der Pijl, “Two faces of the Transnational Cadre under Neo-Liberalis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177-207.

^② 譬如,霍尔曼也使用了“欧洲心脏地带”(European Heartland)的表述。参见 Otto Holman, “Integrating Peripheral Europe: The Different Roads to ‘Security and Stability’ in Southern and Central Europ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209-236.

^③ Kees van der Pijl, “Two faces of the Transnational Cadre under Neo-Liberalism,” p. 178.

^④ 如葛兰西所言,“所谓客观,总是指‘人类的客观态度’,可以把它看作同‘历史的主观’恰好相同,换句话说,‘客观’将意味着普遍的主观”。葛兰西将客观与主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参见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中共中央马列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19页。

史集团’，也就是说，复杂、矛盾和不协调的上层建筑综合反映着社会关系总和”。^① 罗伯特·考克斯(Robert Cox)对历史集团的概念进行了发展。他认为，历史集团是物质环境与社会意识联合起来并通过制度表达的一种霸权性的现实，在社会中具体表现为霸权阶级与从属阶级之间的结盟。在一个历史集团中，霸权阶级可以通过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从属阶级的利益，或通过意识形态霸权来获得对从属阶级的领导。^② 在《生产、权力和世界秩序》一书中，考克斯质疑国际关系研究中国家的本体论地位，而力图考察历史和阶级力量造就国家的过程。考克斯认为，国家的根本特征在于其历史集团的特征，历史集团是国家权力赖以存在的社会力量的结构，国家的对外行为是国内历史集团追求利益的结果，“国内政治中历史集团的利益追求与其国际目标是紧密联系的”。^③

关于欧洲一体化，新葛兰西主义者的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第一，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寻找欧洲一体化产生的国内背景，侧重关注国内历史集团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安德鲁·马伦(Andrew Mullen)运用新葛兰西主义路径(更具体说是考克斯式的历史主义)，对英国左派关于欧洲一体化的态度变迁进行了考察。缪伦认为，英国左派的欧洲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历了三次重要变化：1945—1970年的“从漠不关心到支持”、1971—1987年的“从支持到反对”及1988年之后的“从反对到支持”。缪伦进一步争辩到，在全球、欧洲和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各种竞争性社会力量的权力均势，导致了英国左派在欧洲一体化政策上的这些变化。^④ 安德烈亚斯·比勒尔(Andreas Bieler)主要从工人运动角度对欧洲一体化的国内背景进行了考察。在《瑞典工会和经货联盟：欧盟会员之辩的修正》一文中，比勒尔发现，在1994年瑞典是否加入欧盟这一问题上，跨国工会组织对其表示支持，而国内工会组织则表示反对。而且，瑞典的跨国工会组织不再将其对欧盟成员国身份的支持与强化欧洲范围内的工会合作，以及欧盟社会政策结合起来考虑。^⑤

在《劳工与未来欧洲资本主义模式的斗争》一文中，比勒尔对瑞典和英国工会

① 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0页。

② Robert Cox,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 in Robert Cox and Timothy Sinclair, eds., *Approaches to World Ord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131-133.

③ 譬如，1678—1873年间，贵族与资产阶级通过结盟在国内政治中建立了立宪君主国家，然后在国际政治中通过采取重商主义政策和均势外交而保证其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生产关系的发展。1873—1945年，垄断资本通过对内与工人阶级形成社会妥协，对外侵略和扩张来维持“竞争的帝国主义”的生产关系。1945年以来，国家垄断资本在国内避免与国内工人阶级进一步妥协，而在国际上建立自由开放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参见 Robert W. Cox, *Production, Power and World Order: Social Forces in the Making of Hist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105-108.

④ Andrew Mullen, "The British Left: For and Against Europe? A Historical Survey," *Capital & Class*, No. 93, pp. 217-231.

⑤ Andreas Bieler, "Swedish Trade Unions and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The European Union Membership Debate Revisited?"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Vol. 38, 2003, pp. 385-407.

关于经济和货币联盟,以及欧洲进一步合作的态度进行了分析。比勒尔的基本结论是,两国工会都支持加入经济和货币联盟,但英国的跨国劳工比瑞典的同行更倾向于在地区层面的合作。瑞典劳工在其国内有较为优势的政策实现手段,而英国劳工在国内相关政策过程中较为边缘化,所以英国劳工更乐于将欧盟视为寻求其政治影响的替代性舞台。作为一种结果,英国工会继续反对新自由主义,而瑞典的一些跨国工会组织则开始接受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① 在《合作还是抵御? 工会和欧洲的新自由主义重构》一文中,比勒尔对“欧洲工会组织正在被欧盟范围内的新自由主义所重构”这一观点表示质疑。比勒尔通过对英国和德国工会的案例进行分析发现,即使这些国家的工会接受了经济与货币联盟,但这些工会仍然反对其暗含的新自由主义假设并要求其在操作时进行折衷和修正。^② 比勒尔还运用新葛兰西主义对欧盟扩大进行了更为宏观的比较分析。他认为,新自由主义的重构是奥地利、瑞典在1995年加入欧盟及未来中东欧加入欧盟的主要社会目的。然而,这两组欧盟扩大的路径有所区别。一方面,在奥地利和瑞典国家层面发生了重要的阶级斗争。在奥地利,一个倾向于欧盟成员国身份的历史集团在已经完全是国际定位的资本和劳工的基础上形成,而瑞典跨国资本和劳工仅仅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亲欧盟联盟,因为跨国资本倾向于用新自由主义重构来理解欧盟,然而跨国劳工却希望在地区层次上重新获得对资本的控制。另一方面,在中东欧的新自由主义重构主要通过外在的欧盟成员国身份来实现,其主要立足于中东欧国家精英和跨国资本之间的联盟。^③ 缪伦和比勒尔的研究都在用案例来证明考克斯的结论,即国际政治变革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内生产关系的变革及相应的阶级变化。

第二,从训诫自由主义(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和新宪政主义角度进行分析。加拿大学者斯蒂芬·吉尔(Stephen Gill)认为,训诫新自由主义是一种保护和强化资本统治的生产关系模式,它在不同国际层面上通过与反对性社会力量的斗争形成各种具体形式。吉尔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地区性嵌入(regional embedding of neoliberalism),是通过外部强制的塑造来征服欧洲成员国国内的社会力量。^④ 他还进一步提出并阐发了新宪政主义概念。吉尔认为,新宪政主义是一个国际治理框架,它试图把经济政策与政治责任分割开来,使政府对市场力量更具

① Andreas Bieler, "Labour and the Struggle over the Future European Model of Capitalism: British and Swedish Trade Unions and their Positions on EMU and European Co-oper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 10, 2008, pp. 84-104.

② Andreas Bieler, "Co-option or Resistance? Trade Unions and Neoliberal Restructuring in Europe," *Capital & Class*, No. 93, 2007, pp. 111-124.

③ Andreas Bieler, "The Struggle over EU Enlargement: A Historical Materialist Analysi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9, No. 4, 2002, pp. 575-597.

④ Stephen Gill, "Globalization, Market Civilization and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24, No. 3, 1995, pp. 399-423.

回应性。新宪政主义是训诫的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法律维度上的表现,其核心观点包括:保护私有产权和投资者自由,以及市场通过约束国家和劳工以保证私人投资者收益的确定性等等。吉尔将《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下面简称《马约》)和经货联盟解读为训诫的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吉尔看来,欧洲一体化在20世纪80、90年代的加速源于欧洲各国的金融危机和货币体系动荡。《马约》和经货联盟试图通过建立统一货币将货币动荡的威胁最小化,并同时将各国的政治承诺锁定在市场原教旨主义的逻辑之中。当然,支持统一货币的跨国历史集团并不仅仅由跨国投资者和国际金融管理者组成。在这一去国家管制浪潮中获益(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阶层或集团共同构成了这一跨国历史集团。吉尔还对欧洲一体化的结果进行了反思性的评价:欧洲一体化或新自由主义的“阿基里斯之踵”在于其市场导向的政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大规模失业的持续增加,而失业增加与种族主义、反移民浪潮等社会问题纠缠在一起并对民族国家产生治理的压力。^①

第三,从欧洲工人阶级视角进行论述。范德皮杰对欧洲跨国资产阶级和跨国管理阶级的形成进行过论述,但未对欧洲跨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过分析。比勒尔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白。比勒尔对欧洲层级的工会组织进行研究,考察其是否已经发展成为独立的超国家行为体,还是仍然作为国内工会组织在欧洲的秘书机构存在。比勒尔的基本结论是,与跨国生产结构密切关联的工会组织更易于在欧洲层面形成合作,也更容易具备自主性和独立性。欧洲工业联合会(European Industry Federation)便是其中典型的例子。而一些主要基于国内生产活动的工会组织则缺乏在欧洲层面活动的需要,也不易于产生国际合作并具备自主性。例如,由于教育基本上仍然是国内的生产活动,所以欧洲教育工会委员会(European Trade Union Committee for Education)不需要在欧洲层面进行更多的集体谈判和利益协调。^②

四、法兰克福学派:公共领域、社会福利与集体认同

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该学派中对欧洲一体化研究最有贡献的是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哈贝马斯就欧洲一体化的发展提出两个重要观点:第一,强调从社会欧洲或福利欧洲的角度来推动欧洲一体化。当谈到欧洲公民身份时,哈贝马斯指出,“我这里指的并不是集体政治行动

^① Stephen Gill, “European Governance and New Constitutionalism: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and Alternatives to Disciplinary Neoliberalism in Europe,”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No. 1, 1998, pp. 5-26.

^② Andreas Biele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the Transnational Restructuring of Social Relations: The Emergence of Labour as a Regional Actor?”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43, No. 3, 2005, pp. 461-484.

跨越国界的可能性,而是指‘对欧洲共同福利’的义务意识”。^① 哈贝马斯的观点是对德洛尔改革的一种理论抽象。前法国财政部长德洛尔在1985年就任欧盟委员会主席之后,启动了社会欧洲的方案,试图推动与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发展相配套的社会一体化。^② 德洛尔的改革使得哈贝马斯思考欧盟重新唤醒社会民主的可能。这不仅仅需要对经济发展进行直接干预,还需要确立一些劳动和社会的最低标准、消除贫困和社会排斥及保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等。第二,强调欧洲公共领域对未来一体化的作用。^③ 一方面,哈贝马斯指出,欧洲一体化进一步推进的主要困难在于“各民族国家的公共领域在文化上还相互分割着”;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对未来充满期望,“但在将来有可能从各个不同的民族的文化中分化出一个共同的政治文化”。^④ 哈贝马斯认为,欧洲一体化造成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导致了各种社会矛盾,但这些矛盾如果加以创造性处理的话,可以提供一种政治动员。“这将加强公共议题的生活世界相关性。同时,那些只有靠欧洲范围内协调才能解决的问题的压力也增加了。在这些条件下,可以建立起全欧洲范围的公共领域中的交往联系,它们为密切联系着的各地区的新的议会机构——一个具有更大能力的欧洲议会创造有利的环境”。^⑤ 在《包容他者》一书中,哈贝马斯进一步强调了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重要性及其与公民社会和政党系统的相关性。哈贝马斯这样表述道,欧洲一体化的“关键不在于某个‘欧洲民族’的实质,而在于建立起欧洲政治公共领域的交往网络;它扎根在共同的政治文化当中,基础是一个公民社会,包括诸多不同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公民运动等;具体表现为各个政党都能自觉地遵守欧盟机构的决策,并在议会党团保持团结之外,形成一个新的欧洲政党系统”。^⑥ 哈贝马

①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童世骏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7页。

② 德洛尔的社会欧洲方案说服了一些左翼的欧洲怀疑主义者,他还试图展示欧盟直接干预经济的能力。这些都体现在德洛尔的1993年白皮书《增长、竞争与就业》中。德洛尔的主要成就体现在欧盟公共采购能力的增强,以及在运输与能源、信息高速公路、环境三大领域的发展。他试图在欧洲单一市场的去管制逻辑下构建一个新的凯恩斯干预主义领域,德洛尔的再造战略实际上为那些在民族国家边界内逐渐失效的社民主义努力开辟出一种新的选择。参见Lawrence Wilde, “Europe and the Re-regulation of World Society: A Critique of Habermas,” *Capital & Class*, No. 93, 2007, pp. 49-51。

③ 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最好被描述为一个关于内容、观点、也就是意见的交往网络;在那里,交往之流被以一种特定方式加以过滤和综合,从而成为根据特定议题集束而成的公共意见或舆论”。参见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446页。哈贝马斯特别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结合起来讨论。“公共领域的交往结构还需要得到一个充满活力的市民社会的维护。”参见[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456页。

④ [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672页。

⑤ 为保持语句的通顺,该句的译文在引用时略有修改。[德]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第671—672页。

⑥ [德]哈贝马斯:《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65页。

斯对欧洲公共领域的强调使得这一内容成为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①

在《后民族结构》一书中,哈贝马斯主要把民族国家、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放在一起讨论。哈贝马斯认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之下受到强烈冲击,^②而欧洲一体化是民族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全球化的一种手段。同时,欧洲一体化也根本性地改变了传统民族国家的秩序:第一,欧盟作为一个公共管理机构正在形成,而且关于欧盟征税的方案将成为下一阶段欧洲一体化的重点;第二,作为成员国的民族国家逐步让渡主权给欧盟,而欧盟越来越发展成为一个新的主权实体,拥有对内治理和对外代表的完全主权;第三,欧洲公民的概念正在讨论之中,欧洲公民权也是未来欧洲发展的重点之一;第四,民族国家失去的福利能力将由欧盟来承担,一个社会欧洲将会形成。^③哈贝马斯概括了对待欧洲一体化的四种立场:怀疑主义、市场主义、联邦主义和世界主义。怀疑主义试图在与经济全球化的对抗中重新夺回民族国家的自主性,市场主义希望从单一市场中获利但又不希望发展中央的政治机构,联邦主义寻求更为强大的欧洲国家和发展深入的社会协调政策,世界主义使用后民族国家构建这一方式来推动全球层面相应的合作型制度建设。哈贝马斯认为,怀疑主义正在退守其立场,而逐步接受单一市场的既成事实,并与市场主义结成默示的同盟。就未来而言,他主张,欧洲联邦主义是世界主义民主秩序的前提,而联邦欧洲的出现是欧洲一体化的方向。哈贝马斯认为欧洲一体化的关键取决于两点:第一,欧盟能够补偿民族国家失去的能力;第二,在欧盟内应该发展一种强大的、足以使后民族民主结构合法化的集体认同。^④

在之前的论述中,哈贝马斯着重强调公共领域和社会福利对欧洲一体化的作用,而在《分裂的西方》一书中,哈贝马斯则试图从集体认同的角度为欧洲一体化寻找新的动力。他强调,欧盟内部的团结要摆脱被全球活动家主导的消极责任模

① 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参见 Ruud Koopmans and Jessica Erbe, "Towards a European Public Sphere?" *Innovation: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Vol. 17, No. 2, 2004, pp. 97-118; Hans-Jörg Trenz and Klaus Eder, "The Democratizing Dynamics of a European Public Sphere: Towards a Theory of Democratic Function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7, No. 1, 2004, pp. 5-25; Erik Oddvar Eriksen, "An Emerging European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Vol. 8, No. 3, 2005, pp. 341-363; John Erik Fossum and Philip Schlesinger, e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a Communicative Space in the Making?*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② 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主要表现在:第一,全球公共问题的出现使得民族国家的管理能力下降,而资本的跨国加速流动使得民族国家的税收出现萎缩;第二,民族国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界限和主权身份越来越模糊,国际组织越来越多地干预到传统民族国家的主权范围之内;第三,外来移民的增加使得公民的身份复杂化,而且,全球化加剧了公民身份与族群身份的紧张;第四,民族国家税收的萎缩直接影响到其社会福利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第79—90页。

③ 〔德〕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第158—161页。

④ 同上书,第101—103页。

式,而需要在共同外交行为和共同内部政策等过程中形成一种广泛的归属感。^①这种归属感在民族国家层面的形成主要基于一种共享的民族历史,而在欧洲层面的形成则需要外在的认同构建。哈贝马斯认为,世俗化的经验、国家调节市场的经验、社会进步复杂性的经验、工人运动与宗教运动调和的经验、反对武力和残忍的经验、欧洲国家间战争的历史、国家衰落的历史等七种经验可能会促进欧洲认同的形成。^②从整体来看,与阿姆斯特丹学派和新葛兰西主义者将欧洲一体化视为新自由主义的一部分明显不同,哈贝马斯将欧洲一体化视为对猛烈的新自由主义的一种渐进替代。一些偏左的自由主义思想家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罗伯特·昂格尔(Roberto Unger)和豪克·布伦柯斯(Hauke Brunkhorst)等都持有类似的观点。^③这些自由左派思想家都试图将欧洲一体化作为减少全球政治中民主赤字的一种办法。当然,欧洲怀疑主义者也会以欧盟的技术管理性质及自身的民主赤字问题来批评这一类观点。^④

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趋同

三大流派在分析欧洲一体化时偏重的问题有所差异。阿姆斯特丹学派将跨国阶级作为欧洲一体化分析的重要概念。范德皮杰在早期主要关注欧洲跨国资产阶级的形成,而近年来更多分析欧洲跨国管理阶级的影响。阿姆斯特丹学派还将世界体系论的“中心—边缘”维度整合进其理论分析之中,这体现在范德皮杰的“洛克心脏地带”和霍洛曼的“边缘资本主义”等概念之中。新葛兰西主义者则关注欧洲一体化的国内动力因素及一体化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缪伦和比勒尔主要使用新葛兰西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对欧洲一体化的国内历史集团进行分析。而吉尔则主要关注欧洲一体化的性质,并用“训诫自由主义”和“新宪政主义”等概念对一体化背后的新自由主义特征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中对欧洲一体化论述最有影响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关于欧洲一体化的分析可以总结为建设社会欧洲或福利欧洲、发展以欧洲公民社会和欧洲政党系统为中心的欧洲公共领域,以及构建欧洲的集体认同等三方面。从学科特征来看,阿姆斯特丹学派和新葛兰西主义都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交叉地带,而法兰克福学派则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哲学的学科之间。相比而言,阿姆斯特丹学派和新葛兰西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 Divided West*,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6, p. 80.

② Jürgen Habermas, *The Divided West*, pp. 46-48.

③ Ulrich Beck, *Cosmopolitan Vision*, Malden, MA: Polity, 2006; Hauke Brunkhorst, *Solidarity: From Civic Friendship to a Global Legal Community*,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Roberto Unger, *What Should the Left Propose?* London: Verso, 2005.

④ 高奇琦:《欧盟民主赤字的争论:国家主义与多元主义的二元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80—101页。

主义的实证主义色彩更浓,而法兰克福学派的规范主义特征更明显。从意识形态来看,新葛兰西主义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更强烈些,阿姆斯特丹学派次之,而法兰克福学派在哈贝马斯的折衷下已经整合进一些自由主义的元素,如公共领域概念就有很强的自由主义特征,以及哈贝马斯认为欧洲集体认同需要调和工人运动和宗教运动等等。

当然,三大流派也并非完全泾渭分明,其中也存在一些相互影响和交叉重叠。譬如,新葛兰西主义对阿姆斯特丹学派有着重要影响。范德皮杰在其跨国阶级的分析中同样运用历史集团、霸权、新自由主义等概念。欧文比克在对阿姆斯特丹学派的回溯性文章中有很大篇幅提到新葛兰西主义者考克斯观点。^①正因为如此,国内一些学者把阿姆斯特丹学派归入新葛兰西主义的范围之中。^②同样,阿姆斯特丹学派对新葛兰西主义的发展也有推动作用。如在范德皮杰跨国阶级分析的启发下,比勒尔对欧洲跨国工人阶级进行了详尽和深入的探讨。另外,法兰克福学派对新葛兰西主义也有一些影响。譬如,比勒尔对欧洲话语赤字关注受到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概念和对话民主理论启发。^③再如,比勒尔在其2006年专著中将其关于欧洲工会的分析与社会欧洲的构建结合起来,而社会欧洲的分析中便有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子。^④

三大流派的相互融通和交叉实质反映出这三大流派的结构主义分析特征。结构主义解释是相对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工具主义解释而言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解释的根本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经济决定论。客观而言,这一分析模式是极为深刻的,触及到资本主义国家一体化活动的本质。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也都在资本逻辑的基础之上进行更为复杂的演绎或者增加更多的解释变量和分析元素。这一分析对目前西方欧洲一体化的主流理论仍然是具有借鉴意义的,然而,这种“经济决定论”会招致标以“简化主义”的一些批评,所以,目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欧洲一体化的三大流派都在政治经济分析的基础上整合社会和文化分析。从整体而言,三大流派所表现出的特征及其与垄断资本主义解释的关系可以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欧洲一体化研究的“社会学或文化学转向”。

这种转向与西方国际关系对欧洲一体化研究的主流理论变化相一致。20世纪70、80年代后,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主要在功能主义和政府

① Henk Overbeek, "Transnational Class Formation and Concepts of Control: Towards a Genealogy of the Amsterdam Project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Development*, Vol. 7, 2004, pp. 126-129.

② 王铁军:《新葛兰西主义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欧洲》2000年第1期,第14页。

③ Andreas Bieler, "The Deficits of Discourse in IPE: Turning Base Metal into Gold?"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2008, pp. 103-128.

④ Andreas Bieler, *The Struggle for a Social Europe: Trade Unions and EMU in Times of Global Restructuring*,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6.

间主义之间展开。功能主义理论主要由(老)功能主义和新功能主义组成。尽管前者强调技术专家在跨国合作中的作用,而后者偏重利益集团、政党和政治家在跨国合作中的作用,但两个理论都在一些公共问题领域建立跨国性的功能性组织,这样跨国合作会自动扩展和外溢,并最终导致更高层次的合作。^① 政府间主义理论则由(老)政府间主义和自由政府间主义组成。尽管前者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在世界体系中施动的整体,而后者则认为民族国家的行为和偏好受到国内政治的影响,但两个理论都强调一体化是为民族国家利益服务的,同时在一体化过程中,成员国政府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巩固。^② 无论是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都以工具理性的态度看待欧洲一体化,都把一体化视为特定行为体在特定利益框架下通过战略行为实现利益和偏好最大化的过程。用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en)的话讲,这两大主流理论都属于“结果性逻辑”(logic of consequentialism)。^③ 然而,西方欧洲一体化的这两大主流研究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受到新发展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冲击。^④ 而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则认为,人类不能脱离社会环境及其文化而存在。我们身居其中的社会环境界定了我们是谁,以及我们作为社会存在的身份。因此,行为体的偏好不能被看成是外生的,或者是从给定的物质结构中推断出来的,而应被看成是“社会构成的”。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把欧洲一体化视为成员国和其他行为体在欧洲层面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而在这一社会化过程中成员国和其他行为体的利益和

① 这里为了讨论的方便,所以在功能主义之前加了(老)。后面的政府间主义也采取了同样的处理办法。新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厄内斯特·哈斯(Ernst B. Haas)及其学生里昂·林德博格(Leon Lindberg)。Ernst B. Haas, *The Uniting of Europe: Politic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rces, 1950-1957*, London: Stevens, 1958; Ernst Haas, *Beyond the Nation-State: Func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Leon N. Lindberg,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European Economic Integra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② 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Stanley Hoffmann, "Reflections on the Nation State in Western Europe Today,"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21, 1982, pp. 21-37; Stanley Hoffmann, "Obstinate or Obsolete? The Fate of the Nation State and the Case of Western Europe," *Daedalus*, Vol. 95, 1966, pp. 862-915; 自由政府间主义的代表人物是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安德鲁·莫劳夫奇克(Andrew Moravcsik)。参见 Andrew Moravcsik, "Negotiating the Single European Act: National Interests and Conventional Statecraft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5, No. 1, 1991, pp. 19-56; Andrew Moravcsik, "Preferences and Power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A Liberal Intergovernmentalist Approach," *Journal of common Market Studies*, Vol. 31, No. 4, 1993, pp. 473-524.

③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2, No. 4, 1998, pp. 949-951.

④ 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是一种内涵的两种表述。建构主义是国际关系学领域中的主流话语,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相对。参见秦亚青:《译者前言》,载〔美〕彼得·卡赞斯坦、〔美〕罗伯特·基欧汉、〔美〕斯蒂芬·克拉斯纳主编:《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2页。社会学制度主义在比较政治学领域中较为流行,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对应。Peter A. Hall and Rosemary C. R. Taylor, "Political Science and the Three New Institutionalisms," *Political Studies*, Vol. 44, No. 5, pp. 936-957.

身份得到了建构和界定。简言之,这两种理论主要关注欧洲作为一种社会共同体如何影响或界定了成员国及其他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并进而影响了其对自身利益的看法。^① 在这种特定身份之下,行为体依靠评估当前身份和选择情境之间的相似性来追求个人的行动机遇。在这一过程中,行为体并不是追求给定偏好的最大化,而是在追求适当的结果。按照用马奇和奥尔森的表述就是,在依照“适当性逻辑”行事。^② 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来看,从功能主义和政府间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变迁同样可以被总结为西方主流一体化理论的“社会学和文化学转向”。从较为宏大的背景来看,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表现出趋同的特征,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概念同样可以应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中。譬如,垄断资本主义解释的实质是结果性逻辑,而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分析则更多蕴含了适当性逻辑的元素。

结 语

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实质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在 20 世纪后期的研究缩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经由一些亲莫斯科的共产党组织,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在欧美得到很大程度的传播,所以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经济分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分析的主要理论工具。因此,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解释成为当时欧洲一体化分析的主要内容。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伴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日益繁荣及其自主性的增强,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结构马克思主义和新实证马克思主义等发展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流派。^③ 从这些流派的主要观点来看,以生产关系逻辑为核心的政治社会分析或政治文化分析逐渐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特征。所以,阿姆斯特丹学派、新葛兰西主义和法兰克福学派在对欧洲一体化的解释中表现出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明显不同的

① 建构主义在欧洲一体化研究的标志性成果是《欧洲公共政策杂志》1999 年的特刊。参见 Thomas Christiansen, Knud Erik Jorgensen, and Antje Wein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 4, 1999, pp. 528-544; Jeffrey T. Checkel,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 4, 1999, pp. 545-560; Andrew Moravcsik,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Constructivism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6, No. 4, 1999, pp. 669-681。

② James G. March and Johan P. Olsen,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pp. 949-951.

③ 徐崇温:《“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214—431 页。

理论风格。^①

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关于欧洲一体化的研究与其整个理论发展脉络也紧密地契合在一起。传统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功能主义实质是自由主义理论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投射,而政府间主义实质是现实主义理论在欧洲一体化研究中的应用。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从根本上反映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逻辑,或者说是结果性逻辑。到20世纪80、90年代,建构主义异军突起。之后,建构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的研究逐渐成为欧洲一体化理论中的重要部分。建构主义的实质是反思主义的逻辑或者说是适当性逻辑。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这两大学科中出现的合流趋势实际反映了社会科学中共同的一个特征,即经济学逻辑向社会学逻辑的转向(或者说是从“经济人”假设向“社会人”假设的转向)。经济学逻辑的特征是线性思维,以资本和利益等为核心概念,用成本和收益的权衡理性地分析社会现象。社会学逻辑的特征是非线性思维,以关系、集团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用冲突和认同的紧张关系反思地分析社会事务。从更为哲学的高度来理解,这种经济学逻辑向社会学逻辑的转向是普遍性逻辑和特殊性逻辑之间辩证关系的一部分。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往往在两者之间摇摆。一段时间普遍性逻辑会占据主导,而另一段时间特殊性逻辑则可能会更为主流。从上述转向的特征来看,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实际上处于普遍性逻辑相对主导而特殊性逻辑作用在上升的阶段。

^① 贾文华先生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欧洲一体化研究的这一变化总结为从资本逻辑到生产逻辑的过程。笔者认为,变迁的朝向应该表述为生产关系逻辑,而不是生产逻辑。生产逻辑的本质仍然是经济学逻辑,而生产关系逻辑的重心在关系,其本质是社会学逻辑。